

艺术史研究丛书 范景中主编

ECHOES FROM THE JADE HALL

A Rhetorical Strategy in the Early Ming Painting

玉堂遗音
明初翰苑绘画的修辞策略

李若晴 著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艺术史研究丛书 范景中主编

ECHOES FROM THE JADE HALL
A Rhetorical Strategy in the Early Ming Painting

玉堂遗音
明初翰苑绘画的修辞策略

李若晴 著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责任编辑 祝平凡
装帧设计 张惠卿
责任校对 柴伟斌
责任出版 葛炜光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玉堂遗音：明初翰苑绘画的修辞策略 / 李若晴著
— 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2.6
ISBN 978-7-5503-0305-8

I. ①玉… II. ①李… III. ①中国画—研究—中国—
明代 IV. ①J2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16765号

玉堂遗音：明初翰苑绘画的修辞策略

李若晴 著

出品人 曹增节

出版发行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http://www.caapress.com>

地址 中国·杭州南山路218号 邮政编码310002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制版 杭州海洋电脑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浙江省邮电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次 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15

字数 160千

印数 0001-2000

ISBN 978-7-5503-0305-8

定价 35.00元

目 录

导论 / 1

第一章 以翰林院为核心的明初宫廷文化圈 / 9

第一节 明代的翰林院制度 / 9

第二节 明初的台阁文化 / 14

第三节 书画在宫廷文化圈中的收藏与流通 / 21

第二章 驺虞入献 / 40

第一节 重建国家权威与思想秩序 / 40

第二节 驺虞进献与相关贺礼 / 44

第三节 翰林官员与《驺虞图》 / 50

第四节 《驺虞图》绘者与绘制时间考 / 60

第三章 麒麟远来 / 69

第一节 麒麟入贡 / 69

第二节 《瑞应麒麟图》考析 / 73

第三节 曾棨与《明人画瑞应图卷》 / 79

第四节 被遗忘的长颈鹿 / 97

第四章 江岸送别 / 114

第一节 王绶与赵友同 / 114

第二节 《凤城饯咏图》题跋诸人与王绶、赵友同之关系 / 120

第三节 江岸送别：山水画的一种图式 / 128

第五章 燕云入画 / 141

第一节 迁都的争议 / 141

第二节 载笔从征：巡狩队伍中的翰林官员 / 148

第三节 燕云入画：迁都的信号 / 155

第六章 杏园雅集 / 182

第一节 三杨主政 / 182

第二节 画中人物的辨认与粉本的意义 / 189

第三节 对身后令名的渴望 / 199

结论 / 218

参考文献 / 221

后记 / 234

导 论

明英宗正统二年（1437）暮春三月初一日，翰苑中的九名阁臣齐聚于京师城东杏园雅集，参与盛会的宫廷画师谢环绘制了《杏园雅集图》以志此事。杏园的主人谨身殿大学士杨荣在图跋中描写当日雅集的情形：“时春景澄明，惠风和畅，华卉竞秀，芳香袭人，觴酌序行，琴咏间作，群情萧散，衍然而乐。谢君精绘事，遂用著色写同会诸公及当时景物。”又感慨道：“图其事以纪太平之盛，盖亦宜也。”¹ 杨阁老面对眼前美景感到由衷的欣慰，满园的春色，似乎正象征着国家欣欣向荣的太平景象。他确实有理由为自己的政绩自豪，他是“仁宣之治”的缔造者与守卫者之一。“仁宣之治”是中国历史上气象宏大的时代。经过永乐、洪熙、宣德三朝的励精图治、涵濡休养，明帝国不仅内部“民气渐舒，蒸然有治平之象”²，而且“威德遐被，四方宾服，受朝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幅员之广，远迈汉唐”³。虽然正值壮年的宣宗中道崩殂，但太平盛世并未就此结束，英宗少年登极，太皇太后张氏行使摄政之权，内阁依然受到倚重，朝野上下普遍憧憬着一个“正统之治”的到来。

本文将探讨的，正是此类与翰苑官员密切相关的纪事性绘画的修辞策略⁴，时间则历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朝（1402-1449），这恰好是

明朝第一代内阁成员的始末时间。从永乐元年明成祖选取七名翰林官员入阁参预机务，至正统年间“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先后谢世，近五十年间，是明朝阁臣摆脱幕僚身份，逐渐走向政治前台的过程。这七名阁臣是解缙、黄淮、胡广、杨荣、杨士奇、金幼孜、胡俨⁵，七人虽同年入阁，但此后际遇大不相同。解缙、黄淮在夺嫡之争中一则身死，一则滞狱十载，胡俨转调国子监，胡广早逝，只剩下杨士奇、杨荣、金幼孜以师傅之尊入主仁宣二朝的内阁，并开启内阁直接掌控六部行政事务的先例。请记住七人的名字，我们的故事将因他们的悲欢离合、升降荣辱而展开。

除了处于整个文官体制顶端的七名权臣外，还有其他翰林官员将进入我们的视野。自唐宋以来，翰林官便属清华之选，其衙门素有“玉堂”之称，宋人叶梦得《石林燕语》记：“学士院正厅曰‘玉堂’，盖道家之名。初，李肇《翰林志》末言居翰苑者，皆谓‘凌玉清，溯紫霄’，岂止于‘登瀛洲’哉，亦曰‘登玉堂’焉。自是遂以‘玉堂’为学士院之称”⁶。明代翰林官员之清贵，又较唐宋有过之而无不及。就明代特定的政治制度而言，翰林院既是宫廷文化圈的核心部门，又是朝廷养望储材的重要机构：“夫国家二百年来，名臣硕老，强半出自玉堂精选”⁷。

书画作品固然是点缀斯文的重要手段⁸，但明初翰苑词臣对于显性或者隐性的政治权力的猎取，对于生前身后之名的追求，无疑是产生纪事性绘画最为重要的动力。此类作品所具有的学术与艺术价值，主要在于委托者不是水间林下的隐逸之士，而是居庙堂之高的官员，他们往往一身二任，同时也是左右一时风气的文学家与评论家。绘画、书法是与文学紧密联结的艺术形式，披览翰苑官员的传世文集，时时可见题画的诗文，他们喜好收藏法书名画的风气十分浓厚。因此，艺术史研究者将有机会在阐释政治与文化权力的交叉部分中发挥重要作用。

本文尝试将绘画置于历史情境中进行解读，并以作品为线索，勾勒出一幅 15 世纪上半叶明代宫廷的文化图景。笔者相信，只有把绘画史的研究重点从审美与技术的层面扩展到社会文化中进行整体考察，才有可能充分认识其起承转合的演变过程。这一做法，或有别于历来明代宫廷绘画研究以画家和画派为单一考察点的叙述模式。纪事性绘画的艺术水平如何，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重要的是透过这一艺术现象，去获知它们所处的时代与制度，故而图画与跋文的内容和功能，是本文首要的关注之处。它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明代前期的翰林官员如何利用绘画艺术来增强个人声望或者博取身后令名。

与本课题相关的论文，就笔者所知，有加拿大学者李嘉琳（Kathlyn Liscomb）所撰《权力共生：中国纪念性艺术中的一种修辞策略》（“Foregrounding the Symbiosis of Power : A rhetorical strategy in some Chinese commemorative art”）一文，以《驺虞图》、《北京八景图》等数件纪念国之重典的卷轴画为切入点，探讨永乐年间数名权臣委托绘制此类艺术品的用意所在。李嘉琳认为纪念性艺术品重叠官方和私人两个领域，是一种修辞性策略：用于提升权臣的社会地位，融洽他们与帝王之间的关系。这种半官方化的纪念性艺术品强调一种权力共生的理念，君臣相互依靠，共同建立显赫名望⁹。《权力共生》一文涉及内容较多，受篇幅所限，许多问题缺乏深入探讨，不少细节也未曾展开，不过它在研究视角的选择、叙事的风格等方面对于本文却是颇有启迪意义的。

明代之外从修辞策略角度进行绘画史研究，也不乏力作，譬如美国学者孟久丽（Julia K.Murray）发表了《作为艺术家与赞助人的宋高宗：王朝中兴》（“Sung Kao-tsong as Artist and Patron :The Theme of Dynastic Revivalt”）¹⁰，《曹勋与两件南宋历史画》（“Ts’ ao Hsun and Two Southern Sung History Scrolls: Auspicious Omen for Dynastic Revival and Welcoming

the Carriage”)¹¹等重要论文。这两篇论文重点考证传宋代萧照绘《中兴瑞应图》的绘制时间、作者、传承并分析其政治功能。此外,美国学者石慢(Peter C. Sturman)《鹤临开封:徽宗一朝的瑞应图》(“Granes above Kaifeng: The Auspicious Image at the Court of Huizong”)一文,分析了《瑞鹤图》与《宣和睿览册》的关系、舞鹤与徽宗大晟乐的关系、徽宗一朝的瑞应事件、图像的真实性等问题¹²。这都对本文的写作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与近二十年来西方历史学界探讨政治权力多面向、多种形式体现的研究趋势相呼应,西方中国美术史学者对中国古代绘画所显现的权力性质的研究角度逐渐浮现,打破长期以来在传统文人绘画观下寻求作品意义的单一性,关于宫廷绘画的研究日渐增多,对于作品政治意涵的解读颇有进展,而政治权力的研究横跨人文社会学科,其范畴与内容日益丰富,不再集中于政权“显性”的变化¹³。不过在中国大陆,从政治权力的角度对古代纪念性绘画进行解读,仍是当前美术史研究中一个较为冷僻的领域,就笔者目力所及,除了少量介绍性文字外,专门研究难得一见。正如李嘉琳所批评的,长期以来,佚名的记事性或装饰性绘画不受中国主流评论家重视,他们普遍景仰著名画家而蔑视绘画的叙事功能,即使他们有时因为史料价值收集和著录此类作品,许多美术史学者继承了这一艺术批评传统,结果导致他们相应地忽视了这类作品¹⁴。

明代绘画是中国古代绘画史研究中的重要内容,然而在过去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关于明代宫廷绘画的研究仍显薄弱。以往的论著大多只停留在一个笼统的认识,或只对几名代表画家的生活经历、艺术成就和历史贡献进行讨论,而于其他细节研究非常缺乏。宫廷绘画在晚明以来浙、吴两派对峙的历史叙述中,几乎不占任何历史地位。学术界并非无视明廷绘画的存在,而是很少从宫廷绘画特殊性的角度去考察画史的进展。

明廷绘画不能简单等同于浙派研究，其研究重点不应局限于画家身分与画风的相合、画风的传承、与吴派的关系等问题，还应包括宫廷制作的各种细节以及无法以浙派归类的作品。只有把宫廷绘画作为讨论主体并采用新视角，才能改变以往的单一讨论模式，而呈现多面向的历史叙述。明廷绘画如何走向成熟，当时的社会思潮、文化氛围给予画家和画风以何种影响？明初帝王的宫廷政治和文化生活，赋予绘画风格以何种特色？这些都是需要做细致分析的课题。

孤立地解读，此类纪事性绘画平淡无奇，而其严守明初台阁体格而写成的诗跋更是千篇一律，令人读之味如嚼蜡，但是，当我们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观看它们，就会发现它们呈现的独特意味。在解读作品时补上这个背景，既需要学识，也需要历史想像力。在写作中，一连串萦绕笔者心间的问题是：它们在当时为何出现，如何制作，如何使用，成效如何。诸如此类的问题，当我们努力探求其各种可能的答案后，它们便不再仅仅是文献记录的注脚，而呈现出自身特殊的意义。

但在讨论此类纪事性绘画的政治性质时，不能简单地将复杂的政治权力等同于政治功能。中国人对于古代诗歌的传统解读，常常将文学史与政治史联结在一起，仿佛每一首诗歌都是某一政治事件的必然产物，其结果不免求之过深、反成穿凿。文学史上的这种治学习习惯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绘画史研究。事实上，当艺术作品与时代背景二者的复杂关系被单向化处理后，作品所承载的政治意涵不免被窄化为显性的政治功能。王正华先生就曾指出狭隘的政治功能观必然会限制中国绘画史研究对于政治权力角度的探讨，他认为，功能意味着画作背后有一实际而特定的政治目的，意欲达成某种明确的效果，在此前提下，则作品的产生与使用的因果逻辑只能单线发展，仿佛某一政治功能的需求产生某一作品，该作品只为一个政治目的而存在。即使个别政治宣传画可能如此，

但以之推及所有具有政治性质的作品，则会一方面窄化了研究的议题，无法拓展政治权力研究的广阔视野；另一方面也简化了作品产生与使用的关系，无法全面呈现复杂的政治意义与作用¹⁵。总之，将纪事性绘画作为某一政治事件的注脚，无疑是一种“胶柱鼓瑟”的做法，也是本文所要尽量避免的。基于上述考虑，本文将对以下问题进行求索。

第一章、以翰林院为核心的明初宫廷文化圈。本章将通过分析明代翰林院的职能、翰苑之中的文化活动、翰林官员与宫廷画家的关系三个问题，初步展现明初宫廷文化圈的一般概貌。

第二章、驺虞入献。驺虞入献是永乐二年的一件政治大事，也是明成祖重建国家权威与思想秩序的重要举措之一。本文将分析周王进献驺虞的前因后果，并考证进献颂诗、绘制图画翰林官员。

第三章、麒麟远来。永乐十二年，榜葛剌国入贡麒麟（即长颈鹿），引起朝臣的广泛兴趣，翰林官员沈度、曾棨分别据此绘制了麒麟图。本章结合他们各自的生平、仕途与性情，分析两卷作品所承载的不同政治意涵。

第四章、江岸送别。明初宫廷文化圈中，书画作品的交流、欣赏，主要是一种政治公关手段，书画在文人士大夫社交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僚友调任他职或致仕还乡时，他们往往以书画作为离别的赠品。本章将以王绂《凤城钱咏图》为例，分析绘画在此间的功能与意涵。

第五章、燕云入画。永乐元年，北京就被定为陪都，明成祖开始萌生迁都的意图，但南北之间文化的隔阂，使迁都之议不能得到朝野文化价值上的认同。永乐十二年，胡广、杨荣等十三名翰林官员以“北京八景”为题进行诗歌倡和，并绘制《北京八景图》。他们采取何种文化策略，来削弱因迁都带来的南北文化隔阂，将是本章的关注之处。

第六章、杏园雅集。明英宗正统二年，翰苑中的九名阁臣齐聚杏园

雅集，并绘制图画以志此事。本章首先以内阁首辅杨士奇的仕宦经历，展现一名明初翰林官员的政治抱负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接着分析两卷《杏园雅集图》的异同，指出粉本的使用在此类纪事性绘画中的意义。最后通过分析参与这一盛会的官员的诗文，探讨他们在桑榆之年对获取身后令名的殷切之情。

注释：

1. 杨荣：“杏园雅集图后序”，《文敏集》卷十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204页。
2. 《明史》卷九，宣宗纪，中华书局，1997年，125页。
3. 《明史》卷七，成祖纪，中华书局，1997年，125页。
4. 修辞策略，是修辞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特指修辞的方针、思考、方案与程序，详见高万云“浅谈修辞策略”，《修辞学习》2001年5期，1-2页；郑荣馨“论修辞策略的概念”，《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2卷2期，2003年，93-96页。当代西方修辞学研究较之过去发生了深刻变化，已从单纯的文体研究转向人际交往、群体交际以及跨文化交往等各种人类相互行为的研究。理论的更新和深化扩大了修辞学的视野，为修辞学的跨学科研究开辟了广阔空间。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修辞作为一门理解学科的独特意义，并把这种推理论证方法运用于本学科的研究，在当代的许多领域如经济学、天文学、心理学、文学、历史学、哲学等研究中，修辞学都发挥着重要作用。详见温科学“当代西方修辞学理论的发展与创新”，《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2003年6期，25-30页。Kathlyn Liscomb“Foregrounding the Symbiosis of Power : A rhetorical strategy in some Chinese commemorative art”一文，便是西方学者从修辞策略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美术史的重要范例，本文使用“修辞策略”一词，深深得益于该文的启发。
5. 《明史》卷一百四十七，解缙传，中华书局，1997年，4120页。
6. 《石林燕语》卷七，中华书局，1997年，105页。
7. 此语见明人郭汝荐为《玉堂丛语》所作的序言，详见《玉堂丛语》，中华书局，1997年。
8. 以书画作品装饰翰林院前代已有先例，《图画见闻志》卷六“玉堂故事”记：“太祖平江表，所得图画赐学士院。初有五十余轴，及景德咸平中，只有《雨村牧牛图》三轴，无名氏；《寒芦野雁》三轴，徐熙笔；《五王饮酪图》二轴，周文矩笔。悉令重装背焉。玉堂后北壁两堵，董羽画水，正北一壁，吴僧巨然画山水，皆有远思，一时绝笔也。有二小壁画松，不知谁笔，亦妙，今并在焉。”
9. Kathlyn Liscomb, “Foregrounding the Symbiosis of Power .A rhetorical strategy in

- some Chinese commemorative art”, *Art History*, Vol.25, No.2, April 2002 pp135-161.
10. Julia K.Murray, “Sung Kao-tsong as Artist and Patron :The Theme of Dynastic Revival” ,收入李铸晋 (chu-tsing Li) 主编《艺术家与赞助人: 中国绘画中的一些社会与经济因素》(Artists and Patrons : Some Social and Economic Aspects of Chinese Painting) , A Publication of The Kress Foundation Department of Art History, University of Kansas , pp27-36.
 11. Julia K.Murray, “Ts’ ao Hsun and Two Southern Sung History Scrolls: Auspicious Omen for Dynastic Revival and Welcoming the Carriage”) , *Ars Orientalis*, vol 15, 1985, pp1-29.
 12. Peter C. Sturman , “Granes above Kaifeng : The Auspicious Image at the Court of Huizong ” , *Ars Orientalis*, vol. 20 , 1990 , pp33-68.
 13. 王正华: “传统中国绘画与政治权力: 一个研究角度的思考”, 《新史学》八卷三期, 1997年, 165页。
 14. 见注8, 158页。
 15. 王正华: “传统中国绘画与政治权力——一个研究角度的思考”, 《新史学》八卷三期, 1997年, 166页。

第一章 以翰林院为核心的明初宫廷文化圈

第一节 翰林院制度

一、职能与选任

宫廷文化圈以皇帝为中心，由大批文学侍臣组成。从广义上说，所有京官都可能是其中一员，但就唐宋之后的政治制度而言，翰林院是其中的核心部门¹。明代翰林院中的内阁，是中央政府权力运作的中枢机构，因此，同属清华之选，明代翰林官员却远较前朝权重且职能范围更广，其职能大致有知制造、考议制度、经筵讲学、参与科举、编修史志、侍从顾问等²。

明代翰林院官制确定于洪武十八年（1385），设翰林学士一人，正五品；侍读学士、侍讲学士各二人，从五品；侍读、侍讲各二人，正六品；史官修撰三人，从六品；编修四人，正七品；检讨四人，从七品；五经博士九人，正八品；典籍二人，从八品；侍书二人，正九品；待诏六人，从九品。又定华盖殿、武英殿、文华殿、文渊阁、东阁设大学士各一人，俱正五品，班在本院学士之上³。除翰林院本官外，负责训导太子的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经局官员亦可视为翰林官员，因为明代官制规定，凡

詹事府官僚暨左右春坊、司经局官员可以与翰林院互相兼职⁴，而翰林官员在詹事府暨坊、局任职者，必须兼带本院官衔。詹事、少詹事带学士衔，庶子、谕德、中允、赞善、洗马则带侍讲、侍读学士以下至编撰、检讨官衔⁵。因此，翰林官员还应包括詹事（一人，从三品），少詹事（二人，正四品），左、右春坊大学士（各一人，正五品），左、右庶子（各一人，正五品），左、右谕德（各一人，从五品），左、右中允（各二人，正六品），左、右赞善（各二人，从六品），洗马（一人，从五品）等东宫官僚。合计翰林官员不超过一百人，但却是中央政府中惟一最高贵的学术集团。

明代官俸是出名的低，翰林官员亦不例外，正五品的翰林学士月俸仅为米十六石，以下每半级递减二石⁶。虽则皇帝时有别赐，但只具象征意义。词臣主要通过撰写应酬文字获取润笔以帮补家用，不过明初润笔甚薄，似乎帮助不大，天顺朝后方渐渐价高⁷。

洪武初建翰林院于皇城內，翰林官员晚朝即宿其中，其后兼考唐宋制度，诏改建于皇城东南宗人府之后，詹事府居其次。永乐年间，行在本院官仍在禁內，供奉不别立公署，正统七年（1442）方于京师长安左门外玉河西岸营建翰林院。虽然翰林院有独立公署，但僚属相聚多在馆阁⁸。

明代第一批翰林官员大多来自荐召，洪武十八年三月廷试，标志明代科举步入正轨，而进士入翰林为官，也自此开始。不过荐举一途并未就此而废。永乐内阁七人中，杨士奇、胡俨便由荐举而非科举，当时也视之坦然。有一次解缙、胡俨同观进士榜，解以胡不由科举出身，故意说：“大丈夫必得黄榜书名耳”，胡俨则反言相击：“彼亦有侥幸得之者”。⁹天顺二年（1458），大学士李贤奏定，翰林院修撰、编修、检讨专选进士，“由此，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而庶吉士始进之时，已群目为储相。通计明代宰辅一百七十余入，由翰林者十九。盖科举视前代为盛，翰林之盛则

前代所绝无也。”¹⁰即使进士出身，也仅有一甲三人及选为庶吉士的少数人能入翰林。天顺朝以后，虽有个别官员不经进士而入翰苑，终归难以立足¹¹。《玉堂丛语》记：“词林故华贵，国初惟材是畀，不局身格，后独以一甲进士若庶吉士充之，他有与者，辄摈不相容，而其途狭矣。”¹²

自从翰林官入选标准确定后，庶吉士成为翰苑官员的主要来源。明代从庶吉士入翰林累迁至六部侍郎、尚书以至阁臣者甚多。庶吉士之考选，始于洪武十八年，采《尚书·立政》“庶常吉士”之义，称为庶吉士。庶吉士经层层选拔，入翰林院继续攻读，学习内容“有‘讲习四书五经’、‘观史传’、‘正唐音’、‘法李杜诗’、‘临字帖’等。每月考试，成绩留档立案。庶吉士三年学成散馆，成绩优秀者，留翰林院任编、检诸职，次者出为给事中、御史，或外任州县官。正统之后，庶吉士不再出局，只入翰林。从此，庶吉士成为士人跻身统治集团上层的重要途径，故而有“储相”之称。不过，这一升迁之路漫长而曲折，《万历野获编》记：

本朝迁官故事，必九年方升二级。他官犹内外互换，惟词臣不离本局，恪守此制，以故有积薪之叹。凡九年满者，若检讨止升修撰，若编修止升侍读，皆仍为史官。惟修撰九年得升中允。而侍读、侍讲再升得为学士，否则官庶及左右春坊大学士。然而不恒有也，盖祖宗朝，凡官僚俱以大臣兼领，无专拜者。¹⁵

又说：“词林极重五品，凡三考始得之，盖已二十七年。”¹⁶换言之，从七品的修检升至五品的学士，须经过三次考核，每次考核时隔九年，总共二十七年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叶盛《水东日记》“学士进官”条：

尝闻曾状元在翰林凡若干年，而后得侍讲学士。太宗一日顾近臣：“曾

荣已与学士矣。”意犹谓其得之早也。祖宗之慎重名爵磨砺人才如此。¹⁷

对于翰林官员来说，漫长等待也很是值得，因为一旦升为学士，也就意味着修成正果，翰林学士向有“玉堂仙”的美称¹⁸，殿试一甲三人只是“天上半仙”，庶吉士则是“半路修行”。《翰林记》“学士荣选”条称：

丘浚曰：“宋人有言宰相有责任之忧，神仙乏爵位之宠，既都荣显又享清闲，惟学士然也。”学士之职在前代为荣选，然所掌者，大封拜、大诏令、大制作之外，下至于青词、斋文、口宣、致语之类无大关系者，皆俾为之，殆无虚日，荣则荣矣，然谓之清闲则恐未也，较之他曹局稍为优尔。我朝之制，制诰诏敕外编纂讲读之余，一切屏去浮文，凡前所谓祷祈宴会之事，恒稀有焉，其职务尤为清闲也。¹⁹

《治世余闻》亦称：“翰林院素称清贵，无簿书之扰。旧有语曰：‘一生事业惟公会，半世功名在早朝。’所谓清者如此。”²⁰大抵明代翰林学士，因不负行政上的实际责任，无专掌，无钱粮簿书之烦，又无须应酬青词、斋文等无聊文字，“望荣地密，从容中秘，得对古今典章沿革，制度得失，恣意探讨，以备一旦之大用。而庶吉士以英俊后起，亦得侍从台阁，受一种最名贵而亲切的教育。实在是国家培植候补领袖人才之一种好办法。”²¹

二、翰林院与内阁

明初废相后，政归六部，皇帝总揽全局，另设内阁大学士，辅助皇帝襄理文墨，内阁学士，即从翰林院分出。《万历野获编》“翰林权重”条称：

内阁辅臣，俱系取词林，至今上任视事仍在翰林院，凡文移俱以翰